

● 教育学

走进 WTO 的文化教育转型思考

邓和平¹, 刘厚惠²

(1. 武汉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 人事处, 湖北 武汉 430070)

[作者简介] 邓和平(1953-),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和比较教育研究; 刘厚惠(1959-), 女, 湖北武汉人, 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经济师, 主要从事人事行政管理研究。

[摘要] 加入 WTO, 既是对硬国力的考验, 也是对软国力的考验。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支撑点是知识文化教育创新。因此, 新形势下的文化教育必须在投资办学形式、人才培养结构、大学新角色及创新教育方面从思想理念到行为加以转型。

[关键词] WTO; 文化价值观; 软国力; 人才结构; 大学角色; 创新教育

[中图分类号] G 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4-0495-07

加入 WTO, 意味着中国正式、全面进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虽然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 但它在本质上既是一种互动、交流、合作的过程与趋势, 又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多维度复合型概念。

一、WTO 的知识、文化价值层面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支撑点是以新知识、新人才、新文化教育为三位一体的现代知识社会。

1.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支撑点是知识文化创新。也就是说, 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是科技创新, 是人的创新精神及其文化价值观。国家竞争优势不是遗传的, 竞争优势必须创造; 传统生产要素无论如何丰富, 都不足以保证长期的成功, 持续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才是关键。托夫勒曾断言, 知识的分配比武器和财富的分配更不平等。知识, 特别是关于知识的知识的重新分配更加重要, 它能改变其他主要权力资源的分配。综观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三个超级贸易强国——美国、德国、日本“三剑客”, 以及几个贸易强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 垄断着世界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市场。也就是说, 它们之所以成为贸易强国, 是因为它们垄断着知识、技术市场。如世界进出口贸易总值排名第三的日本, 靠的是技术创新, 排名第二的德国靠的是技术和质量创新, 而排名第一的美国靠的是技术、质量和知识三要素一起创新, 其中知识创新最重要。另据统计, 全球 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技术贸易的 90% 以上: 美国技术贸易总额中大约有 85% 是来自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 而在英国, 技术贸易总额中有 85% 左右是在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发达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的历程表明, 在 20 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作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科学技术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要素。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论述

他的被称为科技优先的“知识积累型内生新增长理论”时指出,知识的无限更新特征和非完全独占性与经济长期增长密切相关,掌握了科技知识的人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科技观和创新设想是企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他的“新配方”理论生动地论证了知识创意及其背后隐含的创新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性和无限性。

2. 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价值观的跨国传播和创新。也就是说,文化将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教育,通过跨国资本的扩展进行世界范围的重构。跨国经济通过资本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传播着影响、并打破个人主体构成的原有生产、消费意识形态,将人们改造成具有新文化身份的新的生产、消费主体。所谓文化教育全球化,便是凭借经济竞争力带来的各种文化教育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乃至融合,改变各种原有文化教育的特点。因特网和信息高速公路将使得一切文化教育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全球资本的内在作用支配。因此,在这个时代,人的创新潜能开发及其文化教育追求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较量,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更多的表现为文化力和教育力的较量和富有创造个性的文化魅力的竞争。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从根本上刷新人类的社会价值观念,由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归和谐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个人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及其创造能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指路灯和动力源;合作与共享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伦理等等。于是,文化、教育竞争成为人类最高层次的竞争,而且是一决胜负的竞争。而中国当下对软国力积累的追求,即对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的追求,以及对培养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的文化教育的追求,正是这种国际最高层次竞争之势所必然。中华民族只有以一种新的文化教育力量和创新机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并使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量居于世界前列的时候,才是中华民族获得真正复兴强大之时。

二、中国文化教育的转型思考

中国加入 WTO,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文化教育从观念到政策的全面转型。它包括:

1. 大力调整政府投资方向,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改革开放 20 多年,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但绝大部分属于硬件(厂房、设备等)投资,而软件(教育、科研、文化公共事业等)投资占 GDP 的比例明显偏低,教育投资一直在 2.5% 左右徘徊。教育投资的低迷,教育发展的缓慢,成为制约人力资源优化的瓶颈,也严重制约了中国向现代化、向知识社会过渡的进程。科教兴国不能当口号喊,不能当软任务,各级政府要切实牺牲一下硬件投资速度,重点投资发展一下教育、特别是与科技经济发展最密切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我们常常强调教育主权,但只要投资不足造成教育供应不足的时候,营利教育就有市场;当国家投资不足,或形不成主流投资者时,教育主权就只能流于口号。

2. 加快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普及化进程。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问题,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都很迫切。就数量增长而言,我国目前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口比例很低,现阶段大学生仅占同龄人的 5% 左右,北京地区高一点,也仅有 13%,这与发达国家的 30—50% 甚至更高的比例相差甚远,与中低收入国家 8.8% 的平均水平也相差较大^[1](第 108 页)。从高等教育入学率看,美国 1979 年达 50%,日本 39%(1976 年),法国 24%,英国 20%,联邦德国 21.5%,其时苏联也达到 30%。另外 10 年前就有资料说,日本各类高校(不包括成人高校)3 411 所,平均每 3 万人一所高校。而中国有高校 2 400 多所(包括成人高校),平均 50 万人一所高校^[2](第 106 页)。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德国除智力障碍外就几乎没有高中学历以下的就业者,在 30—40 年龄段的就业大军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员比例占到近 1/3。高学历、高素质的劳动大军为德国制造着世界贸易强国和本国财富积累的骄人奇迹。面对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不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的死亡。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需要花大力发展。事实上,优化人力资本进程是一种高水平递进,即当人力资本存量突破某一界限时,社会人力资本的总存量将提升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人力资本生产过少则将陷入“低水平陷阱”;就

质量提高而言,我们当然是取高水平演进,而不能要“低水平陷阱”;要持续、健康、稳定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增进,而不要有悖常理、低质量的、“大跃进”式的“泡沫教育”。加快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要依靠多途径办学。中国加入WTO以后,教育面临三个现实问题:第一,产业性。教育服务被纳入到服务贸易范畴,教育服务是根据市场需求定价收益的;第二,市场性。按市场准入原则,教育市场必需逐步开放,实现教育投资发展的多元化和多途径;第三,法治性。教育管理机制既要与国际教育标准接轨,又要制定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教育标准。此三个问题增加了学校教育的产业性、市场性、竞争性和开放性。教育比国防更具战略意义,发展教育应是国家行为,特别是基础教育。高层次教育投资与发展需要多渠道、多途径,中国加入WTO,将极大地促进民间办学、网络办学,以及外国资源办学的繁荣。

3. 优化教育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架构。优化教育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架构,就是使学校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最佳良性互动,使学校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既能适应产业需要,又能创造新的产业。首先,加强职业教育,大力培养知识技术工人和农民。一个国家工业经济水平,不仅取决于尖端技术人才,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工人素质状况,缺乏优良素质的技术工人和熟练的劳动者,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就难以实现,理论生产力就难以变成现实生产力。中国目前处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发时期,尖端技术产业还很弱小,传统产业及其就业队伍仍是经济发展主体力量。因此,中国产业需要更多的是中、初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以及高级技术工人。国家人事部去年10月首次发布的全国人才市场需求信息表明,在全国重点城市人才市场供求前10位的专业,对大专以下学历的人才招聘占59.2%,大大高于对其他层次人才的需求。据报载,著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亟缺两类人才:一方面是顶尖人才缺乏,不得不重金请猎头公司挖人;另一方面是“知识蓝领”缺乏,导致大量本科层次人员承担“知识蓝领”的一般技术工作,造成人才使用不合理。这种状况表明的也是高级职业教育的短缺。由于认识误差,加上文凭决定人的身分地位的现实社会,愿意当工人、特别是当一线工人的极少。这使得中国出现高学历人才易找,高技术工人难求的新情况。中国目前城镇企业共有1.4亿职工,其中技术工人7000万人,但初级工占了60%,中级工占35%,高级技工仅占5%,而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则占到40%左右^[3](第5版)。因此,加强高、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使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升级,新行业、新工种、新职业将不断涌现,工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演化。资金、技术、设备可以引进,必要的专家也可以引进,但大批高素质、高技术的“知识工人”却无法引进,只能靠我们自己培养。因此,时下社会应形成技术工人大有作为、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也大有作为的观念。

职业教育在今天也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如欧盟11个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比例超过50%。职业教育是进出口总值排名世界第二的德国人经济增长的秘密武器。德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比我国1999年的教育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2.27%还多,由此可见其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及其发展水平。事实上,德国目前失业率约为10%,许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但职校生的失业率却低于2%^[4](第23页)。

农民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近日公布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数据表明,在总人口中占据了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科学素养达标率仅为0.04%,与其他群体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再提高10倍,由当前的0.04提高到0.4%,对全国平均值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农民素质可以说成为制约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瓶颈。只有提高占人口基数很大的农民的科学素养,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才能增强整个国民的持续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将出现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这也同时意味着就业人员素质结构的大规模调整。由于农业劳动力占中国总就业人数近一半,因此最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据有关模拟预测表明,入世后我国将有960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其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素质的提高将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使农民尽快强壮起来?还是强调需要国家出政策、出资金,加强农业人口的教育,包括在职农民和未来农民的教育。在“十五规划”期间,大幅提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这一特殊“准公共

产品”的投资力度。这种投资力度的加大,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和降低农民负担,有助于增进农村社会稳定和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素质,而且重要的还在于开辟了农业补贴、增强农业竞争力的新思路。

其次,大学与企业合作办学,加快培养有市场头脑的“知本家”和有科学头脑、有创新精神和有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家、经理人。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结合实现知识创新和产业创新,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人力资本的核心和灵魂是它具有增值性,而能否增值则取决于企业家独立自主地对潜在的人才、人力、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组合运作,否则,已有的人力资本只具有档案意义。因此,企业家是人力资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企业家的创新意识、科学管理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就不能把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充分调动起来,运转起来,实现人力资本的整体最大限度的价值增值。这里还有一个全球化经理人的问题。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要实现三个市场一体化:即区域市场、全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中国经济要强大,要走向世界,有赖于更多的中国企业打出去。而企业能否走出去,则需要更多全球化经理人的产生。全球化经理人的崛起和被世界承认,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成功与强大的标志,是一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中国加入 WTO 和经济走向全球化,意味着企业空间变大,此时的企业家是否具有现代国际经营的战略创新能力,至为关键。世界一流企业家对全球化都有一种自觉的追求。美国宝洁公司总裁埃德温·刘易斯·阿尔茨特说得好,市场的全球化可能成为决定 21 世纪经济增长速度的首要因素。根据世界标准不能维持的企业,将越来越没有希望在地方一级进行竞争。美国《华尔街时报》曾对经理人国外工作经验进行了一次调查,293 个调查对象分别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负责业务执行的最高主管调查经理人。其中 93 位来自美国,100 位来自欧洲,100 位来自日本。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外国工作经验的在美国为 14%,欧洲为 3%,日本只有 1%。而在国外工作过的在美国达 32%,日本占 19%,欧洲则 47%,几乎占一半。如果也随机抽查一下中国的企业经理,恐怕没有国外工作经历的要占 95%以上^[5](第 7 页)。经济全球化,离不开经理人的全球化,具有跨文化敏感性、跨文化驾驭能力的人,才会领导企业团队在全球市场中取得成功。可以说,全球化经理人是未来中国经理人的发展方向。由此看来,加强全球化经理人的培养也是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第三,调整好学校、学科专业的结构和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教育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注意防止经济上的同构化现象的复制。关于学校结构,除国家重点、大手笔投资确保建设少数重点国立大学,促进原创型基础科学技术理论研究发展外,各级地方政府应着力建设的是能为地方产业创新和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有区域特色的应用学科型大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应大力鼓励发展民间力量办学。民办学校的兴旺发达,既有利于推动各学校之间开展竞争,又有利于一些大型学校不宜于开办的学科专业得到发展。

学科专业防止同构化,主要是注意开办专业的“一窝蜂”现象。同构化的结果便是低度化,专业一样,而学校办学水平不同导致人才知识能力水平差异甚大,更重要的是专业结构失调导致就业结构失调,人为造成社会波动过度。

牛津大学校长克林·卢卡斯在中国大学演讲时说,中国入世后,中国高校必须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作出相应改革。确实,知识社会下的知识是发展中的知识形态,任何一个具有进取精神的学校都会体现出对多元知识体系的追求与尊重,建构起开放的、整合的大课程体系,以求在培养目标、培养途径、学习方式、课程内容与结构、评价体系、管理模式等方面整体创新,从而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面向世界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三、以创新文化教育支撑 21 世纪的中国发展

WTO 是一个世界综合国力的奥林匹克竞技场,不仅检验着各国的硬国力——科学技术知识能量及其产业创新水平,更是检验着软国力——富有无限创造精神的人才,及其能培养出这种创新人才的文化教育。软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张弛度的基础,它的持续爆发需要一个积累过程。因此,我们只

有加大软国力的积累进程,以快速发展的创新教育,带动人才、科技和经济的联动、创新、发展,才能战胜入世的挑战。显然,“创造本位”应是未来中国教育的核心文化价值观。

1. 精心营造开放、自由、宽松的教学生态环境和氛围。确立改革开放的心理定向,就是要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克服各种传统思想障碍,营造民族创新的能量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这块文化园地。创新能力不能拷贝,但可以培育。这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

大学能不能成为创新人才的摇篮,取决于三个因素:个体身心素质、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一般说,三个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后两个因素。学校是人与人发生相互影响的专门场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在学校中感受人的生命价值,并实践着自身发展。那么,只有当人的发展意识得以激活、人的发展兴趣得以保持、人的发展追求得以实现的时候,发展才真正成为主体人的“硬道理”,创新才真正成为主体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创新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开放性文化教育价值观念,其核心在于创设促进主体人在心灵与精神上开放的人文环境。这种观念既有利于人们认识自身的潜能,主动利用教育去发掘它,又有利于促进、完善人的创新能力发挥的社会环境和机制,还有利于全社会尊重人才、尊重能力,把充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作为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当一个社会真正能形成崇尚能力及其创造活动价值的环境、氛围和机制时,创新教育与人才辈出也就落到实处了。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创新的过程都是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而产生的过程。因此,文化接触是实现文化创新的重要条件。中国民歌研究发现一个“民歌窝”现象,即中国民歌发展呈区域性特点,研究人员将这种民歌发展出现在几个特别丰富的小区域性现象戏称为“民歌窝”现象。究其原因人们认为,这些“民歌窝”均处于所谓“鸡鸣三省”的“三不管”地带,民歌之所以特别发达,一是数地民众的频繁交流,通过“杂交”优化了歌文化;二是由于“三不管”,无意中为歌文化自由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氛围。由此联想到,作为各种文化相互接触、碰撞和磨合的专门场所,作为担当传承、传播人类科学文化角色的大学,完全应该成为杂交、创新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的“民歌窝”。文化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时,我们既要“顾后”,更要“瞻前”,大可不必为“文化乡愁”所累,五千年中华优秀文明足以令我们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

2. 坚持现代文化素质教育。坚持现代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以现代思想文化培育具有现代创造性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人。首先,重塑国民品性与人格。按照现代化理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前提。人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人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型和人格的转型,是国民品性和社会性格(社会心理结构)的改造。现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分层、民族分等的重要因素,作为知识文化创新的主体和发挥社会分层功能的大学,应当在现代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培养公民外来知识文化的整合能力。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其《文化至关重要:价值观如何引导人类进步》一书中宣称,“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中弄懂了什么,那就是一切差异的根源都在于文化。”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文化的全球化。以企业发展为例,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企业多元化程度就十分突出,有人戏称为“企业博物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企业在我国同时并存;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在我国也同时并存。这种企业博物馆现象必然带来多种企业文化和多种企业管理方式。随着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种多元化格局还会进一步加剧。另外,中国企业公司也在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当一个国家的职员进驻不同国家时,意味着他们要与世界各国消费者对话,要凭藉“全球的人格”和“杂交文化的凝聚力”赢得公司的声誉、地位和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因此,中国经济、文化等要全面走向世界,无论是管好本土的,还是冲出国门的,都需要大量的具有“全球主权”和“杂交主义”能力的经营者和传播者。第三,培养世界通用的、讲诚信和讲法治的中国人。所谓世界通用、讲诚信和讲法治的中国人,就是既有科学知识,又有文明素养;既有本土优秀文化素养,又有杂交、融合世界文化的能力;既有民主法制观念,又有竞争和创新精神;既懂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懂世界经济、贸易市场规则的世界化新人。入世,可以说就是入的法律、规则之世。入世成功,实质上意味着中国人在经济方面更深入地接受了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反过来当然也意味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不可否认,若无西方全球自由贸易实践作为先导,便不会有什么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对于国际规则,首先是学习,其次是影响。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涉及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和民族约束力的加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核心是规则,一个国家的影响和地位取决于其对国际规则的主导能力。因此,如何扩大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取决于本国公众对规则的理解、参与和制订能力。而要达到上述目标,我们需要对现行国际秩序或规则的运行机制做深入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加大对中国公众进行国际通用的法律、规则的培训教育力度。第四,以多元文化培养多向度的、有生存能力的人。竞争力是什么东西?竞争力是长期的、持续的生存能力。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是最大的劳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是生产力发展最有效的方式。一种经济形态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及其价值理念,因而它也隐含着要求一种新的人性。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际,高等教育要为 WTO 培育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文化形态的实质,就是以多元文化培养多向度的人,就是培养有阳刚之气和超强生存能力的人。在指令性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下,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基本上是:依靠单位和组织生存;依靠人情和“关系”生活;依靠道德和指令工作。这实质上是一种以“权本位”为核心理念的“等、靠、要”的依附性生存发展方式。走进 WTO,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体制与国际结合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与国际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相结合的问题,即它内在包含着有一套有关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及其生存发展方式的设计。海尔总裁张瑞敏在谈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有一句名言:要同“狼”竞争,首先自己要变成“狼”。这里所谓变“狼”,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存发展方式的设计。如何变“狼”?就是从现在起,我们除了传统“羊”文化教育外,还要用“狼”文化教育来培养能同“狼”竞争的中国人。什么叫“狼”文化?就是中国人要占据世界竞争制胜点,必须要求国民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及其素质,以及相应的生存发展方式:人要依靠其勤奋、追求和创新能力生存;人要依靠其行为的理性和制度化来不懈地追求个人和社会成就。关于这一点,1900 年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演讲中说得好,真正有价值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勇敢地走出去,进入世界,锐意拼搏,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前进,继续尝试,又一次失败了,但毫不气馁,竭力再试,敢于直面困难,历尽千辛万苦,摆脱困难,将困难踩在脚下,最终走向辉煌。国家和个人,都应如此。

造就具有上述现代素质和超强生存能力的人,需要崇尚和实施“个人中心价值观”的人本主义文化教育。当我们的文化教育使每个公民充分认识到“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马克思、恩格斯语)”;认识到个人努力依靠“其能力改变不满意的处境,为社会而奉献,实现其人生价值”的真谛时,当他们实现由传统依附型人格向独立现代型人格转移时,当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使人性得到真正的完善时,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创造欲望和竞争才智定能得以充分激活。

3. 重新审视大学的作用,让大学充任时代前进的“火车头”。所谓“火车头”,就是发挥大学塑造软国力,担当科学文化创新火车头的重要角色。软国力,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变数。大学的科学、文化、思想创新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软国力水平。

大学,作为科学的发源地,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化和思想的发源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里将大学喻为“民族和民族意识、文化传统的最高体系”。要着力让大学发挥其最高体系的能量,应包括三方面:出创新思想,育创新人才,做社会中坚。早在 20 世纪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强调,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在他看来,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作为思想者的联合群体,应该为社会提供前驱性,因而具有引导力的精神资源与力量——新的理念与信念、新的道德范式、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的这一办学思想当年曾在北大得到光辉的实现,并使北大以文化“精神圣地”的形象至今矗立在国人心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旗手人物胡适明确提出,“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下手不

可”。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有机体的文化”。一个国立大学的存在理由是在于它应尽两种义务:一是对人类知识总量有贡献;二是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曾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也强调,“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大学的目的决不是仅仅造就多少专家,更在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5](第12页)。美国教育学家克拉克·科尔在其《大学的作用》一书中也深刻指出,每个国家当其具有世界影响力时,都会向在世界发展中居领导地位的智力机构——大学着力。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6](第63页)。当代信息革命和信息产业的旗手比尔·盖茨一言以蔽之,知识经济成功与否取决于高等教育。因此,社会可持续发展完全取决于大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全面创新。

中国大学有着引导中国社会前进的光荣历史。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在入盟WTO,争取赢得世界政治和知识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有利地位的时候,在争取中华民族早日实现复兴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应当担起再出新思想、再出新人才、再创新国运的新的历史重任。

[参 考 文 献]

- [1] 淡华珍.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报告[J]. 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 2000, (9).
- [2] 尚得平. 二战后中日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J].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 1990, (5).
- [3] 雷正光. 高级钳工俏过研究生[N]. 文汇报, 2001-11-19.
- [4] 樊五勇. 如何成为全球化经理人[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1, (2).
- [5] 睦依凡.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及其与治校的关系[J]. 教育研究, 2000, (7).
- [6] [美] 克拉克·科尔. 大学的作用[M]. 陈学飞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涂文迁)

Education Entering WTO: Challenge & Counter-measure

DENG He-ping¹, LIU Hou-hui²

(1.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Personal Department, Animal & Domestic Breeding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DENG He-ping (1953-),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IU Hou-hui (1959-), female, Economist, Animal & Domestic Breeding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 majoring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bstract: Entering WTO is the comprehensive test of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of our country.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is the key to wi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However, as the base of the hard power, soft power including the creative characters and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Some must take the measures as following: continuing the strategy to develop learning society; looking on universities as the head of our country; trying our best to form creative characters.

Key words: WTO; soft power; creative characters